

1841 年香港開埠後三個月，即在清政府還未跟英國正式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前，香港已脫離澳門教區成為「宗座監牧區」，首任監牧為瑞士籍若瑟神父（Theodore Joset, 1804-1842）。香港自此正式與這個從西方傳入的宗教建立關係，同步成長。來自外國的傳教士開始從葡萄牙佔領的澳門，轉移到香港，於 1842 年在中環威靈頓街建立了一座聖堂及宿舍，將香港島作為面向中國內陸傳教的踏腳石，因為當時隔著維多利亞港的九龍半島及內陸（後來被租借為「新界」）仍屬於清廷的統治範圍。

首先，在開埠早期已有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1848）及嘉諾撒仁愛女修會（1860）在灣仔區為基層華人服務。前者在現今的莊士敦道位置創辦棄嬰院「聖童之家」，又陸續開辦學校（即銅鑼灣聖保祿學校的前身）、照顧殘疾者及老婦人的醫療救濟所，以及一間為華人婦孺而設的醫院（即聖保祿醫院的前身）。後者則創辦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醫院（山頂道嘉諾撒醫院前身）及收容視障孤兒的學校等。

除了中環及灣仔，香港仔是天主教會另一個較早建立的傳教點，並且於 1849 年在香港仔岸邊田灣獲得一幅為期九百九十九年的地皮，建成教堂、學校及宿舍。1860 年代，這一帶的船塢日益發展，教會向在這裡工作的中外工程師、工人、水手及漁民傳教，直至後來造船維修業在香港仔式微，神父才改為不定期的探訪。1890 年代，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曾於香港仔為漁民服務，並於 1897 年設立聖家會院，其後開辦私塾（嘉諾撒培德學校前身）及免費診所。

中環堅道主教座堂：面向中國大陸傳教的基地

時至今日，港島區最重要的天主教建築仍是位於中區堅道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1842年6月7日，在距離簽署南京條約前兩個多月，位於維多利亞城「中環」威靈頓街與砵典乍街交界的香港首座天主教堂聖母無原罪堂舉行奠基禮，但1859年一場大火將整座建築嚴重焚燬，其後雖經過復修，但教會決定將威靈頓街的用地賣出，於堅道16號忌連拿利別墅地段興建新的總堂。1888年，新的聖母無原罪總堂於12月7日舉行首次獻祭。該總堂在落成五十年後於1938年12月8日補行祝聖大典。1946年教廷將香港宗座代牧區升格為「教區」，恩理覺主教



圖：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Enrico Valtorta, 1883-1951) 於 1948 年就職為首任教區主教，「聖母無原罪總堂」改稱為「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為符合梵二會議的禮儀改革，座堂正祭台於 1969 年被移至聖堂中央高塔之下，堂內的座椅、擺設及裝飾等也重新佈置。2000 禧年，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把中國一百二十位殉道者列入聖品，教區將這座仿歌德式主教座堂的苦難祭台改裝為中華殉道聖人小堂，置放十六位中華聖人之聖髑於祭台下，又裝嵌了兩扇富中國風的中華聖人彩繪玻璃窗，表達與中華諸聖的共融和祈禱，並於同年 10 月慶祝中華殉道宣聖彌撒。這正是一種中西文化融合的表現。

中環公教進行社：設立首份教區中文報章

成立於 1945 年的公教進行社（公進社）是香港教區宗教、社會和文化活動組織的中心，位於中環的中心區域，是公教真理學會和《公教報》早期的辦公地點，亦是教區與本地信徒建立緊密聯繫的場所。公進社除了設有書籍聖物部，專門售賣宗教書籍及聖物外，也是香港及台灣兩大天主教中文出版社——公教真理學會及光啟出版社的總經銷。公進社原位於干諾道中五層高大廈皇帝行內，距郵政總局以西不遠處，後來再搬進隔鄰經過重建的大昌大廈。公進社在三樓設有聖母無玷之心小堂，除了假期每天都開放，早上和黃昏均有彌撒，以配合希望在工餘及午膳時間前來參加感恩祭、祈禱或想要半刻靜默的上班一族。不少在中區工作的中外白領，在這裡渡過他們成長最神聖的時刻。

《公教報》是本地天主教會首份中文報章，於 1928 年創刊，在日佔時期結束而社會還未正式恢復秩序時，搬進這座大廈內繼續辦公，後來再遷至堅道教區中心。《公教報》雖是中文周報，但首任主編是意大利籍顏思回神父（Andrea Granelli, PIME, 1892-1976），可說是西方視野與華人文化的一個交流園地。

灣仔聖母聖衣堂：源於教友聚落「進教圍」

「下環」（軍器廠街至跑馬地一帶的舊稱，現今的灣仔）原是維多利亞城偏僻之地，只有華人聚居，之後歐洲商人、葡萄牙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陸續到來居住，使灣仔名符其實成為華洋雜處的社區。

在香港開埠早期，政府在「下環」一幅山坡地開闢基督教和天主教墳場。墳墓遷往維多利亞城外的跑馬地後，天主教會於灣仔墳場舊址興建房屋，租給本地的教友及由澳門來港工作的葡籍人士，成為教友村，稱為「進教圍」。1860年，教會又在附近興建聖方濟小堂，是繼威靈頓街聖母無原罪總堂外，香港第二座聖堂，以耶穌會聖人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為主保，故又名聖方濟各沙勿略堂。「進教圍」英文為 St. Francis Yard，中文名字則帶有昔日廣府人圍村的文化影子。今天前往進教圍會經過一條斜坡路，名為「聖佛蘭士街」，「聖佛蘭士」就是取自「聖方濟各 St. Francis」的中文音譯。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時的代牧區恩理覺主教因應教友增長，開始籌建新堂，並得到黃姓恩人的捐款購置堂址。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迫使籌建工作暫停。戰後，恩主教再次呼籲各界捐助興建新堂的費用，而本堂神父理雅各（Giacomo Zilioli, PIME, 1898-1960）及各區教友便積極地奉獻煉靈彌撒以集資，新堂最終於1950年建成，名為「煉靈堂」，新堂並附有一所小學名為「基立學校」。煉靈堂除福傳以外，

亦以救濟品協助了不少貧困家庭。到了 1957 年，煉靈堂再易名為「聖母聖衣堂」。



圖：未拆卸前的聖母聖衣堂（1990 年）

雖然基立學校曾培育了不少學生，但其後因區內適齡學童人口銳減而於 1994 年停辦。不過，嘉諾撒仁愛會則一直在此區為女童提供教育。三年後的 1997 年，教區與發展商合作，將原聖堂拆卸，新的聖母聖衣堂在原址星街一號新大廈內重建成今貌。教會在這華洋匯聚的地區，繼續一方面傳教，一方面從事教育，培育心與靈的成長。

銅鑼灣聖保祿機構：鬧市中罕有的宗教建築群

位於銅鑼灣道的聖保祿機構建築群屬於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會在香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48 年，是第一個抵港的外國女修會。

修女們來港後立即發現每天都有嬰兒被遺棄，大部份是女嬰，且瀕臨死亡，故此照顧棄嬰成為她們當務之急。1851 年修女得到法國「聖童協會」資助，將「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孤兒院搬到海傍附近一幢大宅。隨著孤兒漸漸長大，並因應需要，修會陸續開辦學校、醫院以及年老病弱者的庇護所，收容病人和傷病的海員。



圖：基督君王小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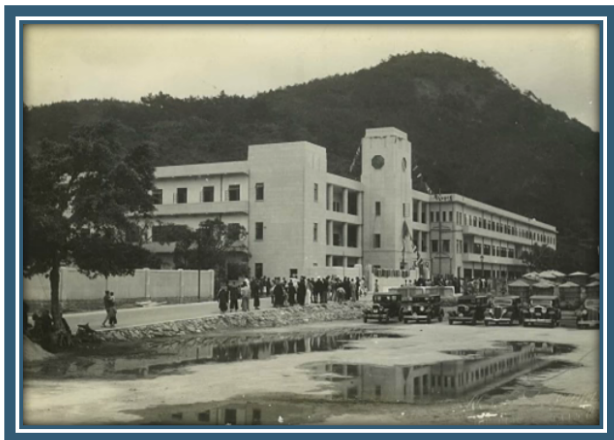
由於工作不斷增加，地方不敷應用，修女們於 1916 年決定遷往銅鑼灣，在那裡建成一間修院及初學院、一所孤兒院、一間英法文學校以及私營的聖保祿醫院。在整個建築群的中間，有一座宏偉莊嚴的聖堂，

名為「基督君王小堂」，於 1930 年 5 月 10 日祝聖，使基督成為修女們生活的中心。

聖堂風格屬於古典復興式，正門有巨型的科林斯柱子支撐該大型建築物，並在十字型的平面交叉點建有一大圓頂。正門和兩個側門入口被修造成為門廊。小堂的一端附有鐘樓，斜屋頂是雙層中式瓷磚。巨大的柱子在建築物周圍形成一個開放的柱廊，並在閣樓支撐著一個開放的廊道。內部有拱形天花板、連接內部閣樓的螺旋樓梯、古典風格的裝飾、豐富多彩的馬賽克地磚和天使雕塑，均為小堂增添了不少色彩。這間優雅的教堂，以古典圓頂、寬廣的門廊和柱廊立面形成本地相當罕見的建築特色。教堂至今幾乎沒有改動過，仍保留著在建成時的狀態。更為重要的是，教堂在高樓環伺之下，從咫尺之遙的銅鑼灣繁忙街道進入其內彷彿置身靜修之所，使人有種遠離塵囂的感覺。聖保祿修院早年被稱作「法國修院」，而聖保祿醫院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法國醫院」，顯示修會來自法國的根源。即使今天外籍修女人數漸見減少，但她們的服務對象，從一開始都是以本地華人為主，見證著華洋共融的實例。

香港仔工業學校：工藝美術的經典

早於1849年，天主教傳教士已來到香港仔開展傳教事業。二十世紀初，隨著香港仔人口增加，天主教徒數目上升，教會於1929年在距離香港仔市中心不遠處的山坡建立聖伯多祿堂。聖堂前身為一座牛房，由意籍嘉樂神父（Giuseppe Carabelli, PIME, 1874-1936）擔任首位主任司鐸。至1949年該堂升格為堂區，由於戰後香港仔區的擴展，教會於1961年將教堂重建成今天的模樣，信徒後來達到二千人。除了香港仔市區，有教徒亦來自對岸當時仍是漁村的鴨脷洲，而且更有一大部份是來自漁民社區。由於他們要出海捕魚或到另一個港口作業，未必每個主日都可以參與彌撒，教會對此採取寬容態度。此外，聖堂主保聖伯多祿也是漁民的主保，因此每年6月29日的主保瞻禮，更由主教親自到聖神修院附近的港口為漁船舉行祝福禮，以西方帶來的儀式，配合本地漁民的需要。



圖：早年的香港仔工業學校

香港仔工業學校於1935年建成，1952年更名前，原稱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建校費用獲馮平山和何東爵士等社會領袖捐贈，目的是為貧困家庭的男孩提供職業培訓，由鮑思高慈幼會負責管理。該會於1859年成立於意大利，其主要目標是教育青年。第一任校長金以義神父（Vincent Bernardini, 1887-1962），曾任聖類斯中學的校監。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學校被英國人徵用為海軍基地，其後作為傷兵輔助醫院。當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日本人用它作為守衛南方的水上飛機基地。翌年獲日本軍政府允許學校重開裁縫和製鞋部門，並宣佈學校為「自由學校」。

這所當時位置偏遠的寄宿學校，秉承天主教慈幼會的傳統，為宿生提供有規律和均衡的團體生活；後來交通改善、學生人數增加，直至八十年代初改為選擇寄宿，九十年代終止寄宿服務，直 2012 年再復辦。香港仔工業學校的學生俗稱「香工仔」，而又由於為慈幼會屬校，故又稱「慈幼仔」。

該校於 2010 年獲評定為三級歷史建築，其主樓是其中一個早期現代建築的例子，由幾個不同設計、高三層而交錯並列的建築組成 L 圖形，在設計上受到一定的裝飾藝術風格影響，如長直形的陽台、舷窗、富有特色的柱和一個結合正門的方形塔的建築特色。內部的裝飾藝術亦可見於主廳和主樓梯的設計上。上海式石膏和使用拋光水磨石飾面是該時期的典型設計。

學校後方的附屬大樓是神父宿舍，這座三層高建築有繪圖裝飾的牆壁、平屋頂和金屬窗花。雖然在 1935 年跟學校同時興建，但建築風格更為新古典或新喬治亞式的外觀。此校是繼西方工業革命後，在香港比較早期成立的工業學校，因為具有罕見的價值及建築價值，成為本地工業教育歷史典範及黃竹坑工業發展的標誌。

薄扶林伯大尼修院及露德聖母堂：發源港島古村落

除了早期香港島幾個重要傳教點因配合城市的興起繼續有所發展外，一些主要的教會機構和歷史建築的沒落也體現香港在二十世紀的轉變。

薄扶林見證內地人口於不同年代遷移到香港的歷史。早於清康熙年間的《新安縣志》已有薄扶林村的記載，可見最早於清初已有原居民在薄扶林村居住，足證該村是港島區歷史最悠久的原居民村之一。薄扶林村居民大部份為潮汕人，多信奉中國傳統宗教，因此其隔鄰的教友村、納匝肋印書館員工宿舍「太古樓」，可說是此區罕有地由天主教徒建立的信仰群體及聚落。

1875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港島西部薄扶林興建了一所照顧老弱會士的療養院——伯大尼修院，每年平均有四十至八十多位傳教士居於此。院內的小堂是按東京的總堂模式建成，是香港出色的新歌德式教堂。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內地的傳教士相繼離開，加上醫藥進步，伯大尼修院的角色逐漸減低。1975 年，傳教會在修院落成百周年之際，將之售予香港置地。土地發展商原先計劃拆卸興建住宅，但香港政府提出以現時置富花園的地皮交換伯大尼修院及牛奶公司牛棚，因而變成為政府產業，並於 1978 年交予香港大學出版社使用，在原教堂裝置印刷機，同時用作儲存書籍及檔案，直至 1997 年再交還予

香港政府產業署管理。2003 年由香港演藝學院接手復修，改建為電影電視學院校舍。

巴黎外方傳教會於 1885 年開辦納匝肋印書館。因印書館後來發展迅速，傳教會於十年後購入位於薄扶林道 144 號的德格拉斯堡，改建作納匝肋修院及印書館之用。修院及印書館高峰時期有五十位員工，從事排版、處理字模和操作印刷機等工作。印書館成立初期至 1934 年間，每年平均出版二十九部作品，印行逾六萬二千冊。出版物包括不同語種，其中百分之廿八是中文讀物、近百分之廿二是安南（越南）文、近百分之十二是法文刊物，甚至有藏文刊物，是香港作為中西文化薈萃角色的又一明證。



圖：香港大學大學堂宿舍（前納匝肋印書館）

由於偏離市中心，印書館員工需要就近的宿舍，傳教會於是向太古洋行購置土地興建小屋，故名為「太古樓」。1935年傳教會開始策劃新聖堂及學校，當時太古樓已有四十八戶人家，村民接近三百人。早期的太古樓居民大多數來自順德、東莞等地，由傳教士招攬來港工作，後來另一條公教村西貢鹽田梓的居民亦前來工作及居住。新聖堂在1938年祝聖，並命名為露德聖母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太古樓與薄扶林村一帶居民日益增加。露德聖母堂門前的空地俗稱為「大地」，是附近孩童玩樂的地方。在1967年法例禁止私人燃放煙花爆竹以前，每逢新年過節，居民都會在太古樓範圍燃放爆竹，有時他們更會將一串巨型的爆竹掛在露德聖母堂堂頂，然後從底部開始燃放，場面壯觀。教友對服務該堂區十九年的明之剛神父（Rene Chevalier, MEP, 1909-1981）十分尊敬。明神父視薄扶林村為南區的福傳中心，在他服務期間教友增至二千人。教堂的管轄範圍曾一度伸延至南丫島，於1957年在該島榕樹灣建立小堂及學校。

納匝肋印書館結束後，傳教會把太古樓的業權轉給香港教區，工人為了另覓工作，便離開太古樓。1976年，教區將太古樓出售，發展成今天的薄扶林花園，而露德聖母堂舊堂亦須另覓新址重建。1982年，位於置富徑一號的天主教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落成，附設新建的露德聖母堂。相隔三十多年，已分散於港九各區及海外的太古樓居民仍保持聯繫，成立了「太古樓之友」團體維持彼此情誼。

黃竹坑聖神修院：首座中西合璧的天主教建築

黃竹坑惠福道六號的聖神修院是香港的教區修院。其前身是創辦於1931年的華南總修院，培育來自韶關、梧州、廣州、江門、嘉應、汕頭、汀州、廈門、福州、建寧、福寧、北海、瓊縣以至香港的修生成為神職人員。古端敏神父（又名古端獻，Thomas Conney, S.J. 1896-1985）是總修院首位長上，其他來自愛爾蘭的神父教授包括范達賢（又名芬戴禮，Daniel Finn, SJ, 1886-1936）、嘉利華（Richard Gallagher, SJ, 1887-1960）等。范達賢神父除了在修院教授神學，亦熱衷於收集中國文物，對香港早期考古學的貢獻尤大。他曾在大嶼山等離島作深入的考古發掘，出土文物豐富，又鼓勵修生搜購古物，亦曾對香港仔的漁民習俗進行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華南總修院與香港仔工業學校因鄰近海岸，被徵用為英國海軍基地及員工宿舍。中國天主教抗戰援助協會在此期間成立，提供人道服務。香港淪陷後，由於缺乏來自羅馬和愛爾蘭的資金支持，全體修生一度要轉往屬於中立地區的澳門的聖若瑟修院。總修院於1945年8月重開，自建院以來，有逾二百五十名神父晉鐸，除了部份屬於香港教區，其他的都到了不同國家和地區服務。這些神父主力於傳教工作，但卻時擔任了促進中西文化交匯共融的角色。除了提供神職培育，修院曾為窮困學童開辦義學，又參與社會救濟，例如出版《院聲》以擴闊神父對社會的公益服務與貢獻。修院培養了許多著名的宗教領袖，包括已故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樞機。

由於政局的關係，教廷傳信部於1964年解散總修院，交由香港教區使用，正式易名為「聖神修院」，兼備大小修院功能。直至七十年代，社會環境及教育政策改變，教區逐步停收小修生；與此同時，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於1970年在同一院址內成立，目前由香港教區、澳門教區、耶穌會、慈幼會及方濟會合辦。



圖：聖神修院



圖：黃竹坑新圍的傳統中式民居

修院大樓具有中西合璧的建築，屬中國文藝復興式，代表當時教會希望將信仰本地化的願景，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與東方建築結合的傑出象徵，希望藉此融合各種文化、種族與宗教的元素。無獨有偶建築的用色與附近黃竹坑新圍這一傳統中式圍村民居非常相近，互相輝映。聖神修院的中華之后小堂於1956年建成，外觀屬現代中國折衷主義式，如使用綠色琉璃瓦屋頂、紅色柱子、灰色牆壁、花崗岩基座和複雜的裝飾圖案，並以現代方式融合在一起。教堂內部空間寬敞，在屋頂桁架、窗戶和祭壇頂篷上展現傳統中國幾何圖案，並以有趣的建築方法將磚和磚石結合在一起，是不可多得的建築遺產。1967年修院在東北角建造了一座新建築，即神哲學院大樓，但與前者在建築風格並不相稱。從整體而言，聖神修院小堂與修院的主樓風格維持了原來的容貌。